

试析明代宫廷服饰与民间风尚的互动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g-dynasty Imperial Wardrobe and Fashion in Popular Culture

许冰彬

Xu Bingbin

内容提要：

紫禁城并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文化空间，宫禁高墙、祖宗成法并不能阻碍宫廷与社会的交流往来。明代宫廷与民间的互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将对宫廷文化产生一定的变革和影响。本文将结合《明实录》、《明史》及明清笔记等相关史料，侧重从明代宫廷服饰风尚的变迁入手，探讨民间社会服饰潮流对宫禁的影响，并试析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成因，力求对明宫廷生活史、宫廷服饰史的研究有所增益。

关键词：

明代 宫廷 服饰 民间 互动

ABSTRACT:

The Forbidden City was not a cultural space immune from outside influences. The high, forbidding palace rampart and imperial ancestors' injunctions did not suffice to impede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court and popular society. Such interactions permeated a wide range of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hus, to a certain degree, influencing and transforming court culture. By looking into related historical literatures such as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Ming shilu)*,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and various notes written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hanges of the Ming court fashion,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exerted by popular fashion culture on imperial wardrobe, and analyzes the cause that led to such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an efforts to contribute to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ies of Ming court life and imperial wardrob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ourt, attire, popular society, interactions

一 前言

在古代皇权社会,服饰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标明身份等级,以别贵贱尊卑。在社会生活中,服饰的形象最为直观,比较容易成为人们区分等级地位的标志,也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因而古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服饰制度,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舆服志》都详尽地记录了不同等级、不同场合的衣饰穿着要求,明代亦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以后,践行北伐讨元檄文里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国理念,革故鼎新,力图继承汉唐,恢复华夏传统文化,在即位之初,便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几个方面制定了一套庞大而等级森严的衣冠服饰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十一日,朱元璋下诏“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¹然而,紫禁城并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文化空间,宫禁高墙、祖宗成法并不能阻碍宫廷与社会的交流往来,如皇帝会出巡游乐,太监或镇守或采办一度遍布全国各地,还有大量征召入宫的民间女子甚至后妃等,明代宫廷与民间的互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将对宫廷文化产生一定的变革和影响。

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宫廷服饰的研究已经出了不少成果,如周绍泉先生的《明代服饰探源》²、陈宝良先生的专著《明代社会生活史》³和《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⁴、王熹先生的《明代服饰研究》、《明代宫廷典制史·服饰》⁵的相关章节,对明代中后期僭越礼制竞趋奢靡的服饰风尚的基本情况做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概括了明代服饰风尚的演变规律,并探讨了其中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宫廷服饰与民间风尚互动的细节论证涉及不多,本文将结合《明实录》及明人笔记等相关史料,侧重从宫廷服饰风尚的变迁入手,探讨民间社会服饰潮流风尚对宫禁的影响,并试析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成因。

二 明代宫廷服饰与民间风尚互动的具体表现

(一) 冠巾首服类

1. 四方平定巾、网巾〔图一〕⁶。这是明初冠服制度制定过程中宫廷直接取自民间衣饰的实例。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初,已经73岁的山阴名儒杨维禎曾应召赴金陵,参与修礼乐书。据郎瑛《七修类稿》记载:“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禎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颁式天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

1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第52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下文凡引用《明实录》处,不再一一注明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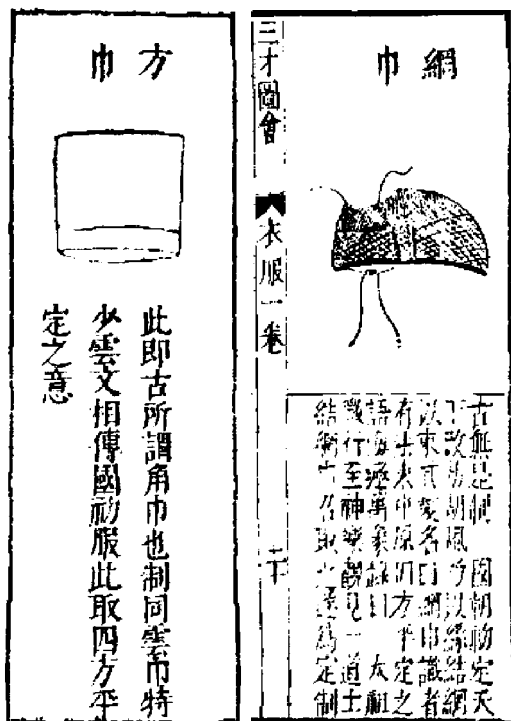
2 见《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

3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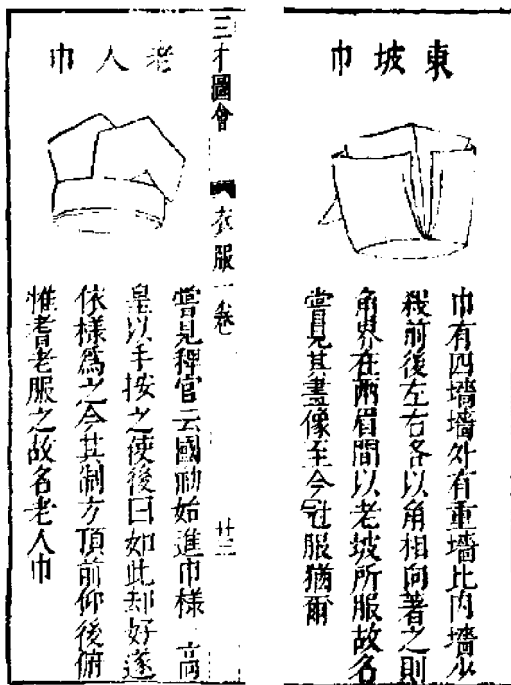
4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王熹:《明代服饰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另见赵中男等:《明代宫廷典制史》(下)第十八章《服饰》,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6 (明)王圻、王思义編集:《三才图会·衣服》,第15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文所引图片皆出于此书第1502~1505页,不再一一说明。



图一 四方平定巾、网巾



图二 老人巾（应即文中长者巾）、东坡巾

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¹ 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任昂奏更定亲王冠礼……具九旒冕、翼善冠、绛纱袍、网巾、金簪服皆在笥……供奉官束发，掌冠者跪进网巾。”² 不但亲王冠礼有使用网巾的典制制度，后世更有皇太孙冠礼加网巾的实例。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十日，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为13岁的皇太孙在华盖殿举行冠礼，“供奉官束发，掌冠跪加网巾。”³ 《明史·舆服志》中说：“天子亦常服网巾。”⁴ 朱元璋微服私访时所见神乐观道士的裹头巾，经过钦定以后，上至皇帝，下至黎民，无贵无贱，皆可穿戴，这也是明代最没有社会等级区分功能的服饰。可以看出，“四方平定”、“万法（发）俱齐”的政治寓意，或许是朱元璋看重这两种头巾的重要因素，但不管怎样，它反映出民间衣饰对宫廷的影响。

2. 长者巾、九华巾。这是民间士子们常戴的头巾，在南都一带极为流行。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都服饰，在（隆）庆、（万）历前尤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新月异。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饼，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⁵ 而紫禁城里的神宗皇帝喜欢类似东坡巾的长者巾（图二），熹宗皇帝喜好九华巾。明末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中写道：“长者巾，制如东坡巾，而后垂两方叶，如程子巾式。神庙恒尚之，曰长者冠。前缝缀一大西洋珠，两傍金五爪龙

1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第14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洪武十七年九月甲子，第2546页。

3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永乐九年十一月丁卯，第1524～1525页。

4 《明史》卷六十六，第162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5 （明）顾起元著、谭棣华、陈稼禾校：《客座赘语》卷一《巾履》，第23页，中华书局，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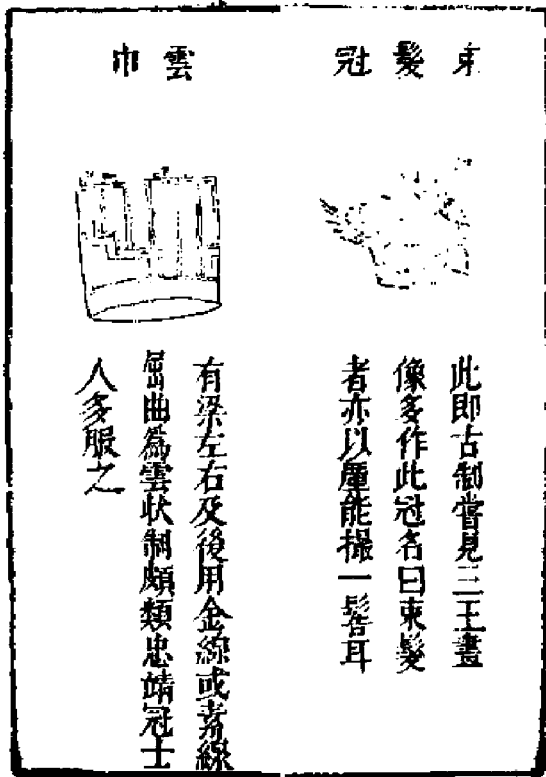
戏之；而后垂两叶之中，亦各蟠苍龙。凡内臣高年之人，亦有戴者。或金线黑线缘镶，然不敢缀云龙也。忠靖冠、六合巾、九华巾、晋巾等制，皆如外廷。先帝恒尚九华巾、圆帽。”¹

3. 云字披肩、束发冠〔图三〕。云字披肩如外间所戴帽套，崇祯皇帝喜欢，令左右戴此随侍²。束发冠则类似一种戏服，两边插着漂亮的长野鸡羽毛，熹宗皇帝较为偏爱，凡是出外游幸，左右随侍皆戴之³。

（二）上衣类

黄鼠甲。这是明武宗自己创造的一种服饰，清初毛奇龄在《武宗外纪》中称为“时世装”，无论宫廷民间都极为流行⁴。顾名思义，黄鼠甲应是一种色彩鲜艳的黄色网状的披甲。明武宗本身好武，不喜官禁礼制束缚，常在西内豹房骑射游乐以及处理政务，并挑选了一支由太监组成的“天子亲军”亲自指挥操练。黄鼠甲本于礼制所无，而是伴随宦官内操练武衍生出来的一种罩衣。正

德十一年（1516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又自领阉人善骑射者为一营，谓之‘中军’，晨夕操练，呼噪火炮之声，达于九门，浴铁文组，照耀宫苑。上亲阅之其名曰：‘过锦’，言望之如锦也。诸军悉衣黄鼠甲，中外化之，虽金绯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细民亦皆披化之……其后巡狩所经虽督饷侍郎、巡抚、都御史无不衣鼠甲见上者。”⁵后世有《宫词》写道：“中外争夸时世装，四家兵甲尽衣黄。至尊新署将军号，过锦频开内教场。”⁶武宗皇帝游戏无度，常做出有违礼制之事，黄鼠甲实际上就是正德皇帝自己创制的一种世俗服饰，本身也不具备等级地位区分的功能，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皇帝喜欢，无论宫廷的内操太监、外朝的文武大臣还是市井细民，即使“金绯盛服”也要披上黄鼠甲，明武宗创制的“时世装”成为一时的风尚。



图三 云字披肩疑即云巾、束发冠

1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7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凡圣上临朝讲，亦尚披肩。至于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谓之曰‘云字披肩’。闻今上登极后，令左右渐次改戴云字披肩随侍，然古制似已顿易也。”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71页。

3 “束发冠，其制如戏子所戴者，用金累丝造，上嵌睛绿珠石。每一座，值数百金，或千余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龙，在上蟠绕。下加额子一件，亦如戏子所戴，左右插长雉羽焉。凡遇出外游幸，先帝圣驾尚此冠，则自王体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带，佩茄袋、刀幌，如唱‘咬脐郎打围’故事。惟涂文辅、高永寿年少相称，其年老如裴升、史宾等戴之，便不雅观。”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服佩纪略》，第172页。

4 (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市井细民无不效其制，号‘时世装’。”收于《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16页，神州国光社，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

5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正德十一年（1516年）二月壬申，第2663～2664页。

6 (清)史梦兰：《全史宫词》，收录于（明）朱权等撰，商传点校：《明宫词》，第165～16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文凡引用《宫词》处，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版本。

(三) 下裳类

1. 马尾裙。这种裙子在成化至弘治时期坊间十分流行，一度影响到宫廷。据《菽园杂记》记载，马尾裙先是从朝鲜传到京城，最初只是富商、贵公子、歌妓等人服用，后来无贵无贱，服者日盛，到成化年间，朝廷官员甚至内阁首辅万安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冬夏不脱¹。马尾裙的形制在今天看来比较奇特，王锜的《寓圃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发裙之制，以马尾编成，系于衬衣之内。体肥者一裙，瘦削者或二三，使外衣之张，俨若一伞。然系此者，唯粗俗官员、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²稍晚一些的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记载：“尝闻里中长老传，数十年前，里俗以鼈（即马尾）为裙，着长衣下，令其蓬蓬张起，以为美观。既无鼈裙，至系竹圈衬之，殊为可笑。”³冯梦龙《古今笑》描写了一个极为迂腐的给事中的笑话：“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⁴虽是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但的确反映出当时马尾裙之流行程度。像一把撑张开圆伞的马尾裙看上去的确非常怪异，可以想象紫禁城内外充斥着下半身圆鼓如伞的官员百姓，实在是对明朝服饰制度一个极大的挑战。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十九日，明孝宗改元还不到二十天，监察御史汤鼎言便上疏申明旧典，弹劾礼部尚书周洪谟治家无法、党附权臣，礼部左侍郎张悦（前为金都御史）身服马尾衬裙，以表式百僚之人，为市井浮华之饰等。弘治皇帝批示：“申明旧典事，其令所司举行，今后有用马尾服饰者，令锦衣卫缉捕。余皆泛言不允。”⁵新君弘治皇帝的一纸禁令实际上已经终止了马尾裙的流行，随后马尾裙便逐渐湮灭无闻了。流行时尚有时真的难以理解，在马尾裙流行的年代，上至朝廷内外，下及市民百姓都认为下衣蓬鼓如伞美观，以至于没有马尾的人腰间也要系上竹圈“令其蓬蓬张起”，而到了于慎行的时代，则成为“殊为可笑”的奇装异服，无人再穿。这里面固然有皇帝禁令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审美观念的变迁。

2. 褙子。万历年间世人所穿的褙子，也称衬褶袍，神宗皇帝也颇为喜好。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中记载：“顺褶，如贴里之制。而褶之上不穿细纹，俗为‘马牙褶’，如外廷之褙褶也。间有缀本等补。世人所穿褙子，如女裙之制者，神庙亦间尚之，曰衬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义也。”⁶

(四) 苏样服饰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各色丝绸层出不穷，染织技术显著提高，进而为服饰种类多样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明代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服饰式样，逐渐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各地争相仿效，当时人称为“苏样”，同样对明宫服饰的影响至为深远。

¹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体虚多，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附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第123～124页，中华书局，1985年。

² （明）王锜：《寓圃笔记》卷五，第41页，中华书局，1984年。

³ （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十五《杂闻》，第176～177页，中华书局，1984年。

⁴ （明）冯梦龙：《古今笑》，第2～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⁵ 《明孝宗实录》卷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甲寅，第191～192页。

⁶ 前揭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第172～173页。

天启时,奉圣夫人客氏喜江南服饰,便教宫人效江南作广袖低髻,尤为生性淡静的张皇后所厌薄¹。到崇祯时期,因为周皇后原籍苏州,田贵妃原籍扬州,都习惯穿戴江南服饰,“苏样”在后宫大行其道,非常流行。《宫词》道:“退红蘸碧轻逾艳,远黛飞霞淡自真。就里细参苏样好,内家装束一时新。”诗后注:“后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²据历官刑、吏、工三科给事中的李清《三垣笔记》载:“上自田贵妃入宫后,凡衣鞋之类,悉用南制,贵妃母扬州人,岁制以进。”³史玄《旧京遗事》里曾记载,圣母概有吴风,颇得崇祯皇帝的欢心,袁贵妃原本骑马善射,也只好改学江南柔美女子的神态,连走路都变得袅袅行步了。宫中盛行江南风尚,京师的妇女也多有模仿,以前都是高髻顶,后来就流行鸣蝉坠马髻,“雅以南装自好”⁴。

苏样之中曾流行素雅之白色⁵。浙江海宁人许敦休在《敬所笔记》中说:“我甲子年(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入泮学中,朋友皆纱巾白布褶,间有一二富公子,则穿色衣。今皆色衣,目中已无白布之衣矣。”⁶其实,许氏所说并非确切,白布之衣流行时期更长,影响也更远,直至崇祯时期的宫廷。万历刻本《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服饰》载:“小民俭嗇,惟粗布白衣而已,至无丧亦服。孝服衣帽,盈巷满街,即帽铺亦惟制白巾帽,绝不见有青色者。人皆买之,问之,云:为其价廉而便益也。惟役于官者不服之。”⁷这是民间无钱小民模仿苏样白衣潮流的实例,而宫廷之中也追逐着“尚白”的服饰风。天启时,蒋之翘《宫词》云:“太液池开菡萏风,花容人袂一般红。时兴纨素雯华动,仿佛行云出峡中。”诗后自注:“时夏服尚用纨素,俗云怀素是也。内衬白纱,外有自然活纹,如水之波、如木之理,故云。”⁸崇祯时期,王誉昌《宫词》写道:“四月轻绡进六宫,素衣惊与至尊同。裁冰笼雪慈云影,不蹋莲舟一瓣红。”“连宵裁就暑衣新,掩映深红雪里春。澹作桃花浓酒晕,分明脂粉画全身。”作者在注中说:“宫眷暑衣从未有用纯素者,葛亦唯帝用之,余皆不敢用。后始以白纱为衫,不加盖饰。上笑曰:‘此真白衣大士也!’自后穿纯素暑衣,一时宫眷裙衫,俱用白纱裁制。内衬以绯交裆红袍腹,掩映而已。”⁹

按照明代舆服制度的规定,皇后、嫔妃命妇们各有自己服饰等级的规定,但是除了重大典礼场合,在实际生活中后妃们往往不太会严格地按规定去着装,尤其是在明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成为新潮服饰变迁和流播的策源地,新式时装不断出现,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关注和效仿,加上皇帝对祖制执行没有那么严格,以及对后宫的偏爱等诸多因素,慢慢这种江南吴风自然也浸润到宫廷之中,从而突破了旧有僵化的宫廷服饰之制。

1 (明)秦徵兰:《天启宫词》,第17页。

2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第75~76页。

3 (明)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第22页,中华书局,1982年。

4 “高皇帝驱逐故元,首禁元服、元语。今帝京,元时鞞穀所都,斯风未殄,军中所带火帽既袭元旧。而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鸣蝉坠马,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以袁娘娘之骑马善射,皇上罢看之后,袅袅行步惟工矣。”(明)史玄:《旧京遗事》,第2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5 关于晚明苏样风尚的研究成果,参见林丽月:《大雅将还:从“苏样”服饰看晚明的消费文化》,收于《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50周年纪念专辑),黄山书社,2004年。

6 (明)许敦休:《敬所笔记·纪世变》,转引自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敬所笔记》全文收录于第318~323页。

7 (明)《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服饰》,第5页,上海古籍书店影印万历刻本,1964年。

8 (明)蒋之翘:《天启宫词》,第57页。

9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第81~82页。

（五）妆容

1. 露行花。即牵牛花，宫中本无此种，天启时由奉圣夫人客氏自民间传入，宫人皆以戴此为美。时有秦徵兰《宫词》写道：“鹦鹉杯深琥珀浓，暮凉频灌露行丛。琼窗妆罢西风晓，插上香云换浅红。”注云：“露行花，即牵牛花也。其色紫翠，如初出炉之银。京师称‘炉银花’。宫中音伪为‘露行’。秋间著花，晨开昼萎。夏月灌以酒，其萎稍迟，而色则变为殷红，不如初开之媚矣。宫中旧无此种，客氏自民间传入，宫人皆爱戴之。京师僮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其客氏宣淫之微欤。”¹

2. 群仙液。客氏从海外（一说岭南）异人传入的护发秘方，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无非是用涂有宫女唾液的梳具梳发，自以为每日勤用，则老无白发。《宫词》道：“觅得丹方助艳姿，不须银海贮桑脂。云鬟细染群仙液，会遣长如二八时。”注云：“客氏命美女数辈，各持梳具，时时环侍左右。偶欲饰鬓，辄以梳具入口，挹津唾用之，昏暮亦然。自谓此方传自海外祁异人，名曰‘群仙液’，服之令人老无白发。”²

3. 珍珠粉、玉簪粉。此为宫人喜用的化妆品，亦由明熹宗张皇后从民间传入。珍珠粉实际上就是将紫茉莉花研细蒸熟之后所得，玉簪粉即将白鹤花蕊剪去蒂，以民间所用粉蒸熟而得之。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其花（茉莉）皆夜开，芬香可爱。女人穿为首饰，或合面脂。”³因崇祯皇帝不喜涂饰，故而宫中妆容俱尚清淡，此化妆用粉不再流行。《宫词》道：“剪玉研珠按候施，腻和芳泽掩冰姿。只应土偶需涂抹，尽把铅华让与伊。”注云：“宫中收紫茉莉，实研细蒸熟，名‘珍珠粉’。取白鹤花蕊，剪去其蒂，实以民间所用粉，蒸熟，名‘玉簪粉’。此懿安从外传入，宫眷皆用之。顾帝不喜涂泽，每见施粉稍重者，笑曰：‘浑似庙中鬼脸。’故一时俱尚清淡。”⁴崇祯帝周皇后也非常喜欢茉莉花，《宫词》道：“砌台花点露华凉，采上云鬟细簇将。翠羽定嫌犹带艳，明珠应恨不生香。”注云：“后喜茉莉，坤宁宫有六十余株，花极繁。每晨摘花簇成球，缀于鬟髻。凡服御之物，亦俱挹取其香。”⁵

4. 消寒花。亦称象生花，本出自嘉兴，袁贵妃喜欢以此装扮，一时流行宫中，但为崇祯帝不喜。王誉昌《宫词》道：“花朵宜簪风髻高，染绡捻蜡一丝牢。图中九九消寒未，且放春风入剪刀。”自注：“袁贵妃善剪彩花。每入冬节，制花朵以为妆助，宫中谓之‘消寒花’。”⁶史梦兰《宫词》：“剪彩消寒制最精，余寒未尽已新正。内人插戴纷相饷，谁识奇花号象生。”引《彤史拾遗》载，“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戴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上问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兴。有吴吏部携来京，而妾身买之。’上不悦。”⁷

三 明代宫廷服饰风尚变迁的特点及成因

综合前文诸多实例来分析，紫禁城并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文化空间，明代宫廷生活与民间的互动也从未

1 （明）秦徵兰：《天启宫词》，第22页。

2 同上。

3 李经纬、李振吉主编：《本草纲目校注》卷十四《草部·茉莉（纲目）》，第557页，辽海出版社，2001年。

4 （清）王誉昌：《崇祯宫词》，第86页。

5 同上书，第90页。

6 同上书，第79页。

7 （清）史梦兰：《全史宫词》，第184页。

停止过,无论皇帝、太监、后妃、宫女还是内阁首辅、文武百官,凡是出入宫禁的各色人等,其服饰或多或少地具有民间流行文化的特征,这也是民间风尚在宫廷生活中的折射。从明代宫廷服饰风尚的变迁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从服饰性质来看,民间风尚对宫廷文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常服、便服上。除了开国之初亲王、太孙冠礼之上的“网巾”之外,大部分和礼服无关。当然,这很可能与礼服的庄重严肃与燕居闲服舒适随性的不同性质有关。

2. 从服饰种类来看,从首服冠巾、发髻、披肩、罩甲到下裳裙子、鞋,直至化妆、护肤护发用品都可以看到民间时尚文化的影响。

3. 从流程度来看,明代前期实例较少,中后期较多,尤其是万历以后的明晚期大量民间流行服饰风尚进入到宫廷。

4. 从进入宫廷的途径来看,大致有三种情形。其一,由皇帝直接从民间引进宫廷,进而以为定制,部分民间服饰流行因素自上而下地流行于宫廷,进而再影响到民间社会生活。如朱元璋时期的平头巾、网巾。其二,一些民间流行的服饰风尚自下而上地传入宫廷,进而逐渐被宫廷接受,同样地流行于宫中。如成化至弘治时期的马尾裙。其三,由民间选入宫中的皇后贵妃等传入的当地服饰文化与时尚。如明末崇祯帝的周皇后、田贵妃。通常来说,紫禁城内后妃宫女的服饰,无论是面料选材,还是裁制式样,自有定制,均具有宫廷特色,自然与民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明代宫廷选妃制度极为特殊,为防止外戚专权,明代后妃均来自民间。当她们入宫之时,必然会将一些民间流行的服饰式样带入宫中。

明代宫廷服饰风尚的变迁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整个明代社会生活变迁、社会新思潮发展的大环境密切相关。考其成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皇帝的好恶可谓与宫廷时尚密切相关。相比较朱元璋,明朝后世皇帝对服饰等级禁令控制相对比较宽松,民间违禁服饰也屡见不鲜。明武宗甚至自创了“时世装”黄氍甲;有的皇帝疏于朝政,不理政事,如神宗、熹宗;还有的皇帝宠爱后妃,爱屋及乌,如喜欢“苏样”的崇祯皇帝,这些都有利于宫廷服饰采撷民间时尚元素,趋于多元发展。

2. 明中晚期,商品经济取得较大发展,城市生活更加繁荣,特别是江南一带,丝绸染织技术显著提高,再加上海外贸易的开拓,为人们的服饰审美观、个性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江南也逐渐取代京师成为流行服饰风尚的中心,成为时尚潮流的引导者。这种勃勃生机的民间文化自然反作用于宫廷,尤其是后妃宫女,她们在枯燥的宫禁生活中也有追求时尚潮流的欲望以及时装的审美需求。

3. 从思想层面来看,朱元璋建立的服饰制度力图恢复淳朴之风,体现传统礼教的精神实质,与宋明理学遥相呼应。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日趋僵化的程朱理学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而强调人的本心作为道德主体,自身决定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的陆王心学渐入人心,为服饰冲破传统样式等级桎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江南的一些城市里,各种服饰争奇斗艳,而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所谓“服妖”现象,对宫廷服饰时尚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 结 语

在朱元璋时代,如此多元化的服饰风尚是绝对禁止的,甚至宫禁之外也不允许。明初对服饰规定极为细致,甚至连平民百姓的日常穿着都有许多详细的条例和禁令。朱元璋希望通过国家意志和严刑峻法强制臣民恪守礼教等级,保持刻板拘泥的淳朴之风。在高压政策之下,明初服饰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朱元璋当初设想的“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维护了礼制等级秩序。如《山海关志》记载:“成化以前,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¹《阅世编》中说:“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者,然色必青,不敢从新艳也。”²当然,这也是与明初生产力尚未全面恢复,社会财富普遍匮乏及权威文化的导向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增加,新思潮的涌现,社会风气、审美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再加上皇帝权威下降,控制不力,服饰禁令已无法阻挡民间服饰风尚潮流的发展革新,直至影响到宫廷禁地。

对于宫廷服饰借鉴民间流行风尚的现象,当时的一些朝廷官员曾流露出忧虑之情。如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在《谷山笔尘》中说:“宫禁,朝廷之容,自当以壮丽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临下之体。宣和,艮岳苑囿,皆仿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为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识者以为不祥。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髣髴,多仿群下之风,以雅素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于贵官达人,衣冠舆服,上备国容,下明官守,所谓昭其声名文物以为轨仪,而下从田野之风,曲附林藪之致,非盛时景象矣。”³于慎行认为,宫禁、朝廷之容与群下山野之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前者自当壮丽示威,后者理应素雅淳朴。衣服器用,不施文采,就山林之士来说,正自不俗,但是对于宫禁来说,如果模仿效施未免有失威仪,“非盛时景象”。于慎行的忧虑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明末清初见证了朝代更替,服饰变易过程的叶梦珠在他的《阅世编》中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⁴此说甚是。总体上看,明代宫廷服饰的民间文化特征只是支流,其“大端大体”的主流宫廷服饰始终无法突破封闭保守的祖制以及礼教等级的束缚,只能固守传统,缓慢发展。尽管如此,明代宫廷服饰中所体现的民间风尚还是给沉闷压抑的宫禁文化带来了一股清新素雅之风,它对宫廷文化的改变及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资信中心]

(责任编辑:韦心滢)

1 (明)詹荣纂修:《山海关志》卷一《风俗》,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18册,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第1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 前揭于慎行:《谷山笔尘》卷三《国体》,第29页。

4 前揭叶梦珠:《阅世编》卷八,第173页。